

民族主义

理论、意识形态、历史

(第二版)

[英] 安东尼·史密斯 著

叶江 译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Second Edition)

Nationalism

Anthony D. Smith

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族主义

理论、意识形态、历史

(第二版)

[英] 安东尼·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 —— 著

叶江 —— 译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Second Edition)

Nationalis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

(英)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著;叶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书名原文: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Second Edition)

ISBN 978-7-208-16707-0

I. ①民… II. ①安… ②叶…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80160号

责任编辑 史桢菁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

[英]安东尼·史密斯 著

叶江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178,000
版 次 202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6707-0/D·3658
定 价 58.00元

在叙利亚和努比亚国，在埃及大地
您安置每一个人于他的所在
您提供他们的必需品：
每个人都有他的食品，而且生卒有定。
他们的语言互不相同，
他们的天性也同样不同；
他们的皮肤更相互区别，
就像您将外国人区分开来一样。
在所有的远方外国，您也创造了他们的生活
因为您在天上建立了一条尼罗河，
……
天上的尼罗河，它是为外国人所设……

（摘自古埃及《阿托恩的赞歌》）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再版译者序

2019年冬，在一次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我遇见了上海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潘丹榕老师，她告诉我说，出版社准备再版由我翻译的英国著名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大家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著作《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2nd Edition*)。当时个人的反应当然是十分支持，并认为应该为这本再版译著写篇译者序。之所以觉得应当如此做，是因为虽然作为译者，我曾为该书第一版中文译本(2006年出版)和第二版中文译本(2011年出版)写过两篇较为简短的译者后记，但是，由于原著作者安东尼·D.史密斯教授已在2016年去世，因此颇想借此机会通过写作新的译者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一下他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并稍稍谈点译者与作者生前的学术交流往事，以表纪念。

然而，意想不到的的是，2020年初新冠病毒突然在全球大流行，出版社再版的事情也因疫情而拖了下来。直到将近一年后，2020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的史桢菁女士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出版社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已经正式启动该书的再版事宜，并且由她担任责任编辑。在邮件中，史女士还询问我是否要为再版的译著新写一篇译者序言或后记，出于上面提及的原由，我的回复当然是肯定的。于是便有了这篇新译者序。

1939年9月23日，安东尼·D.史密斯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户犹太家庭，他父母双方的先辈都来自波兰。他曾求学于英国著名的牛津大

学，学习古典文学，接着又就读于位于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当时(1963年)正值法国总统戴高乐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促使他开始对民族主义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不久之后，他回到英国，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简称LSE)，攻读民族主义研究方向的社会学硕士学位。获取社会学硕士学位之后，安东尼·D.史密斯继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现代主义理论大师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攻读博士学位。在盖尔纳教授的指导下，他成功获取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民族主义诸理论》(Theories of Nationalism)于1976年出版，是他第一本有关民族主义问题的专著。博士毕业后，安东尼·D.史密斯先后在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和雷丁大学(Reading University)任教，并于1980年加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1988年他晋升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1996年从社会学系转到欧洲研究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2002年在欧洲研究所重组之后又转到政府管理系，并于2004年从民族主义与族群研究讲座教授岗位上荣誉退休。

史密斯教授荣退之后依然活跃在西方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学术研究领域。尽管在退休之前不久，他患上了白血病，但史密斯教授在积极与疾病抗争的同时笔耕不辍，继续担任由他创建的学术团体族群与民族主义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主席，并且主编《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学术杂志。非常不幸的是，2016年7月19日，史密斯教授因病去世，终年76岁。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史密斯教授为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终其一生，他出版了18部专门讨论民族、族群和民族主义的个人学术专著，被翻译成22种语言文字而传遍世界。此外，他还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并为不少讨论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重要著作撰写章节。他还与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合作，共同主编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 1994)和《族群性》(*Ethnicity*, 1996)两本有关民族主义和族群问题研究的参考读

本,广泛收集了自19世纪以降以西方学术界为主的关于民族、族群和民族主义问题的经典论述,悉心梳理相关学术研究的源流与发展,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贡献良多。

虽然安东尼·D.史密斯是“现代主义”(modernism)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大师欧内斯特·盖尔纳的博士生,在其治学过程中实际也受到其师的很大影响,比如他基本同意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并且也不完全否认现代民族的市民性或公民性以及政治性,但是在阐述民族的本质特性和历史性及其对民族主义的影响方面,史密斯很有一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治学精神。他坚持自己的研究结论,坚决否认其师盖尔纳所强调的“正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的观点,认为现代民族具有明显古老的族群根源,从而建构起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这一理论一定程度上与其师终身倡导的“现代主义”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分道扬镳乃至分庭抗礼。

从1981年推出《族群的复兴》(*The Ethnic Revival*, 1981)之后,史密斯教授连续出版了《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民族》(*State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1983)、《民族的族群根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1986)、《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 1991)、《族群性与民族主义》(*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1992)、《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1995)、《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1998)、《民族的神话和记忆》(*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1999)、《历史上的民族》(*The Nation in History*, 2000)、《被选的人民》(*Chosen Peoples*, 2003)等一系列论述族群—象征主义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的专门著述。荣誉退休之后,史密斯教授带病继续著书立说,出版了《民族的文化根基》(*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Nations*, 2008)、《族群—象征主义和民族主义:一种文化研究方法》(*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A Cultural Approach*, 2009),以及《成为现实的民族》(*The Nation Made*

Real, 2013)等专著,直到去世之前他还在研究探索音乐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撰写相关专著,真是生命不止、研究不息!

根据其创立的族群—象征主义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史密斯教授认为,民族(nation)的根基在于由神话、回忆、象征、传统等建立起来的族群(ethnic group/ethnie),而民族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决定了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作用。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能从自己民族久远的族群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不断地重新发现和重新解释本民族的活的过去,从而持续地激活本民族的内在活力;另一方面,现代民族一代接一代的民族认同也正是从由民族的族群基础所带来的神话、记忆、象征和传统中得以不断地持续,这一切都使得民族在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中能团结自己的成员逢凶化吉,勇往直前。因此即使在全球化、区域化不断发展的时代,民族和民族主义依然长盛不衰,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这种现象在一体化不断深化和扩大的欧洲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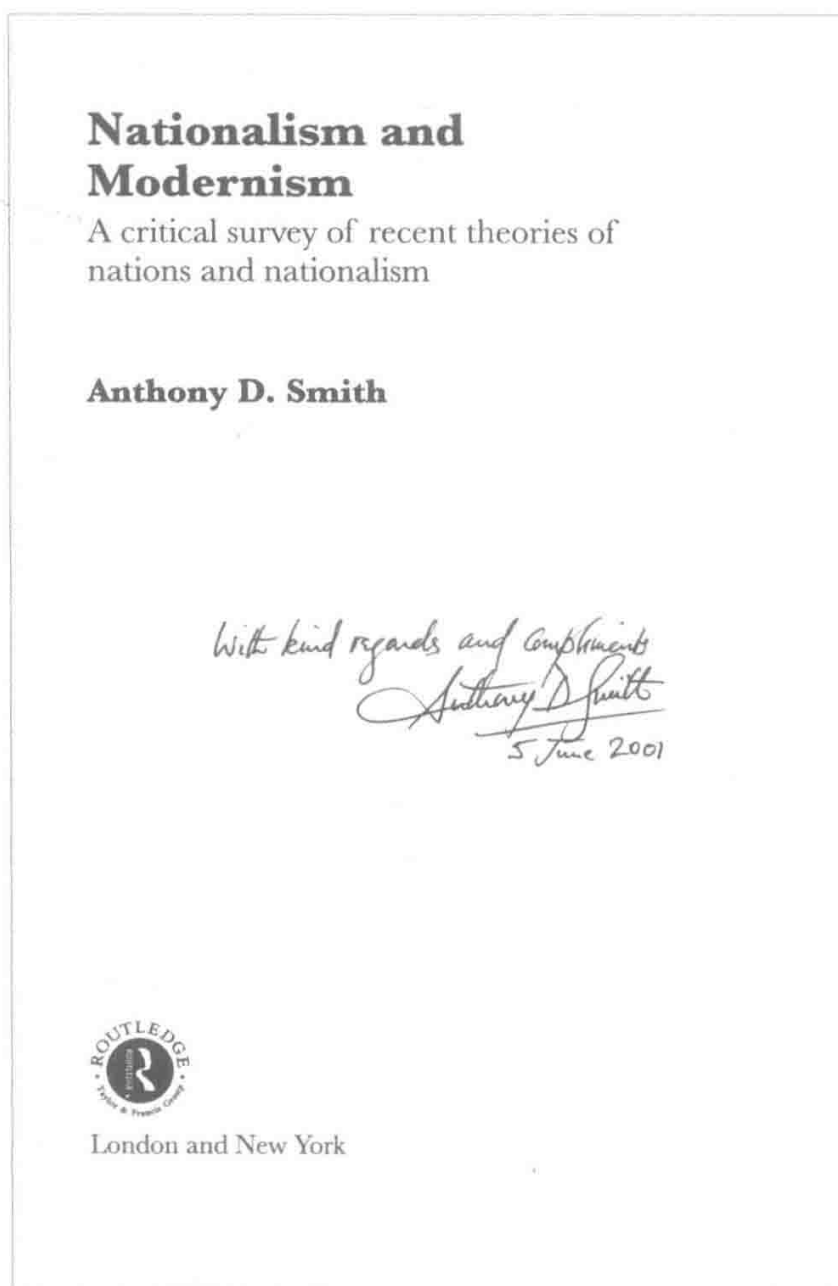
在20年前,正是族群—象征主义理论有关民族的族群根基以及民族与民族主义持久活力的论述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促成我与史密斯教授之间产生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学术交流经历,并最终导致他的学术专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由我译介绍给中国读者。2000年8月至2001年8月,我在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下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研究,主打的研究课题是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经济尤其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然而,十分凑巧的是,当时我作为客座研究员(visiting fellow)所在的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教授原先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他不仅是国际关系学领域英国学派的一员大将,而且也是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现代主义理论的重要阐释者。梅奥尔教授的成名专著《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1990)既是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重要著述,又是颇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专著。梅奥尔教授与史密斯教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共事时,虽然在民族与民族

主义研究领域中有理论分歧,但是却共同合作促使该名校成为欧洲乃至世界闻名的民族主义研究重镇。在我向梅奥尔教授请教有关全球化对欧洲一体化影响等问题时,他认为做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多多关注民族主义的作用与影响,并且指出史密斯教授有关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与民族和民族主义前景的讨论很具启发性。

于是,我一方面从剑桥大学的图书馆借阅史密斯教授的相关专著,另一方面主动通过电子邮件与他本人做学术交流,并提出在他方便的时候去伦敦向他当面请教。或许是出于老同事梅奥尔教授的原因,史密斯教授最终同意与我见面,并通过他的秘书用电子邮件与我约定在2001年6月5日下午去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他办公室做面对面的学术访谈,因为当时正值放暑假,他有空接待我。在去伦敦见史密斯教授之前,我专门在剑桥的书店购买了他1998年出版的《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一书,准备到时候请他签名留念。

在与史密斯教授面对面做学术交流访谈的整个过程中,他从历史、文化、象征等不同的视角对民族的族群性和民族主义的持久性做了阐释,并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不同理论范式做了比较,特别是梳理和分析了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之间的关系,强调从族群—象征主义的视角做观察,不论是全球化还是欧洲一体化都难以扼杀民族和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持久生命力。他还告诉我说,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都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他们与马克思一样,都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不仅具有现代性,而且都是短暂的历史现象。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民族和民族主义因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绝非匆匆的历史过客。对我而言,这次将近两个小时的学术访谈获益匪浅。虽然史密斯教授并未说服我成为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领域族群—象征主义理论范式的拥趸,但是与他的当面交流却使我更为深入地理解了他的一系列研究方法、路径和理论

观点。访谈接近尾声之际，我取出了新购得的他的专著《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请他签名留念，史密斯教授欣然在扉页上题词并签名——“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祝愿，安东尼·D. 史密斯，2001年6月5日”（With kind regards and compliments, Anthony D. Smith, 5 June, 2001）。



安东尼·D. 史密斯教授为译者所作的题词与签名

2001年8月，我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访问研究回到上海，在继续进行全球化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同时，对当代西方民族

与民族主义研究中的现代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理论范式也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探析和梳理。200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我所撰写的《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一文,从此开始,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理论成为我个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这显然与我跟史密斯教授之间曾经有过的直接学术交流紧密相关,当然也与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求教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梅奥尔教授和前所长菲利普·托尔(Philip Towle)博士等著名学者息息相关。

也就在我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拜访史密斯教授那一年——2001年,他推出了《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一版。在很大程度上,该书用非常精炼的笔法将介绍以当代西方学术界为主的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范式和阐述他自己的族群—象征主义等两方面的内容熔于一炉。此书出版后很受西方读者欢迎,在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重印简装本,其读者群体的广泛由此可见一斑。鉴于史密斯教授的这本《民族主义》兼具学术价值和广泛的可读性,加之我个人对作者的学术道路和思想比较熟悉,因此,我在2005年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推荐翻译出版此书,并提出由我担任译者。在范先生的努力之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将由我来翻译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列入“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出版计划,并由宋慧曾女士担任责任编辑。

作为英国以出版社会科学著作著称的普利提出版社(Polity Press)所推出的“关键概念”(Key Concepts)丛书之一,史密斯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旨在简要地概论民族主义概念”,并且在绪论中解释说,“这本小册子旨在向不太熟悉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读者和学生介绍民族主义概念”。然而,由于民族主义概念所涉及的面实在太广泛,仅从学术层面而言,其中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乃至人类学所关注的问题,同时,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概念的争论始终异常激烈,因此,史密斯教授认为,在像这样的一本小册

子中，不可能做详尽的分析和解释。不可避免的是，某些方面会被忽视或省略。但是，即便如此，史密斯教授在该书中还是相当系统地阐述了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中特别是相当完整但又十分扼要地梳理了以他本人的学说为代表的“族群—象征主义”民族主义理论。

正如安东尼·D.史密斯所言，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牵扯的面十分广泛，而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这本并不很厚的学术专著中，作者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乃至人类学的不同角度，对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概念如民族、族群(ethnic group)、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等进行颇为系统但却非常精炼的考察和分析，这显然给中文翻译带来很大的挑战。史密斯教授在书中还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拉丁语、法语和德语来帮助自己的论述，为此我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可谓殚精竭虑，以求正确地表达作者的原意。《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一版译稿完成后，我通过电子邮件与史密斯教授联系，请他为其《民族主义》的中文版写一篇作者前言。虽然当时他已经荣誉退休且研究工作依然很忙，但还是欣然同意。令我吃惊的是，在接受邀请之后不久，史密斯教授就于2005年8月5日请他的助手通过电子邮件将《民族主义》中文版作者前言传给了我。我迅速地通过电子邮件向他表示真诚的感谢，并告诉他一旦他的《民族主义》中译本出版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将会向他赠送样书。

安东尼·D.史密斯所著作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一版中文译本于2006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他的中文版前言中，史密斯教授指出：“自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针对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提出各种新理论的著述不断地产出，同时在全世界各国内涌现出一大批针对这些主题的实证性研究。该主题已经变得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在向我的中国读者提供这卷专著之际，我希望本书对该主题的所作的简要概论能使中国读者将他们自己的经历与全球的民

族与民族主义现象联系起来……”事实与史密斯教授所说相差无几，这本译著在国内出版后颇受读者的欢迎，国内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界的反应似也相当不错，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因为就我个人有限的观察，该书的引用量还是很大的。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英文版第一版出版近十年后，安东尼·D.史密斯于2010年根据这十年中自己及西方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界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这本专著做了较为全面的修订，普利提出版社由此推出了经过作者修订后的第二版。由于此书第一版的中文译著受到广泛关注且销量可观，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第二版的中文译本，并再度由我做翻译，而当时正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任职的王子夔女士则成为新版译著的责任编辑。虽然史密斯教授对他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做了全面的修订，但是他却并没有重新为此书第二版写英文版前言。正因为如此，我也没再度与他联系，请他为第二版的《民族主义》中文版写新的前言。

2011年8月，经过安东尼·D.史密斯修订后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的中文译本正式面世，与第一版一样颇受读者欢迎。由于在一些国际会议场合，我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者如克里斯朵夫·休斯(Christopher Hughes)教授等人那里了解到，史密斯教授的身体状况并不很好，因此在他的《民族主义》第二版的中文译本出版后我也不便再打搅他，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他能恢复健康，继续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史密斯教授的新著《成为现实的民族——西欧的艺术与民族认同，1600—1850》(*The Nation Made Real—A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Western Europe, 1600—1850*)。可惜的是，因为在2013—2016年这一时段中，我的主要研究精力放在了全球发展治理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问题上，所以没有时间阅读他的这本新著，自然也没有与他做任何学术上的联系，尽管我并未完全忽视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不过见到史密斯教授依然在推出学术新作，私心下还是感到宽慰的，并由衷地祝愿

他的学术生命长青。不幸的是，三年之后，史密斯教授还是不敌疾病的长期侵袭而与世长辞，终结了他持久且可以说是辉煌的学术生涯。

在安东尼·D.史密斯教授逝世将近五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他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的中文译本，这应该是对这位族群—象征主义民族主义理论大师的最好纪念。在一定程度上，史密斯教授此书中文版的再版似乎也是我对他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所给予的学术指引的一点回报。衷心希望史密斯教授的《民族主义》中文版的新老读者能像他在中文版第一版的作者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将自己的经历与全球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现象联系起来，通过阅读此书，更为充分地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不断鼓动全世界人民，并令全世界学者们困惑，但又是生死攸关和变化多端的力量。

最后，在本再版译著即将付梓之际，译者要向为此译著作出各种贡献的范蔚文先生、宋慧曾女士、潘丹榕女士、王子夔女士和史桢菁女士表示真诚的感谢！没有他们为此译著所作的贡献就不可能有此书的再版。当然，依然需要强调的是，本再版译著在翻译上所可能产生的错误，则应由译者负责。

叶 江

2020年12月10日

中文版前言

在过去的 20 年里，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变得广泛而流行。1980 年之前在该领域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都相对较少，并且很少有针对这些问题的课程、讨论班和研讨会。学术领域和公众领域都被其他的主题所占领。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探讨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新理论的各种著述不断出现；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一大批针对这些主题的实证性研究。该主题已经变得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而大学则已经开始通过增开有关族群和民族主义的课程来作为响应。伴随着这种状况的是，专注于这些主题的学术文章和学术刊物迅速增长，而且我们每年都可以见到在这一领域内过多的学术会议、专题讨论会和各种讲座。

产生如此高涨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热情的原因不难找到。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且对“世界上没有一块地方能避免民族主义热望”的认识已经渗入到甚至是最保守的学术圈内。民族主义既从邻近的也从遥远的榜样中得到营养；不仅从其他的和早先的各种民族主义中借用技巧和方法，而且它还是一种回应人类某些最深层的对安全、公正和认同的迫切要求的意识形态和运动。这些迫切要求是普遍的需要，并且希望拥有和珍爱自己的民族的心愿给予这些需要以具体的形式。

第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许多渴望获得独立和主权的族群生死攸关。一方面，民族主义允许许多大的或较小的群体进入政治竞技场；另一方面，它也常常导致痛苦的和持续的族群冲突。这些冲突已经成为过去那个世纪国际紧张、危机和战争的原因；而那些战争已变成

总体战，通过对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动员全体人民保卫祖国。

第三，通过将集体的记忆与特定的祖先领土联系起来形成祖国的观念，民族自然地将人民团结在一起。在像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意识时代，这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他们“自己的民族”，个体以“记忆领土化”的方式和对亲密的审美空间的珍爱，将自己定位在时空之中。那就是，同一群体的一代又一代人通过对他们祖先的与特定民族地貌相连的行为和价值观所产生的共享记忆相互联结了起来；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民族的祖地为他们提供了情感上的安全和认同感。

最后，民族主义常常对处于不公平世界中的大多数人民所感受到的社会剥夺和压迫作出回应。通过声明在一个安全的祖国内人们有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权利，在面对不论是由外部的强权还是由内部的结构所产生的全球暴力与社会不公正时，个体就被赋予一种独特的认同和尊严。民族主义常常以这样的方式担当起一种解放的力量，解放全世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并且通过大众的斗争帮助移走某些对世界人民争取更大平等的障碍。

领会民族和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能为许多学术工作提供灵感和基本的原理，其中包括对我自己的学术工作。在向中国读者提供这本专著之际，我希望本书对该主题所作的简要概论能使中国读者将他们自己的经历与全球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现象联系起来。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一不断鼓动全世界人民，并令全世界学者们困惑，但又是生死攸关和变化多端的力量。

安东尼·D. 史密斯

2005年8月于伦敦

英文版前言

本书旨在简要地概论民族主义概念。其目的在于通过专门讨论主要的理论贡献而不是长篇累牍地做实证研究，向学生和读者批判性地综合介绍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现有的学术成果。我的主要目标是考察有关民族主义概念的理论、意识形态和历史的不同的棱面，以及这一领域里的主要解释范式。这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本书较后面的章节所关注的重点将从“民族主义”这一被理解为意识形态、运动和象征性语言的研究对象，转移到其所关怀的客体——“民族”——这一既被理解为人类群体和制度行为的形式，又充满争议的概念。在实践中，上述两个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我认为将两者区别开来又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辨别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之前，以及在它的发源地之外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民族。

在这样的一本小册子中，我不可能进行详尽的分析和解释，有某些方面被忽视或省略的情况不可避免。对诸如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性别与民族等问题的争论，读者可参阅大量的相关著作，也可以参阅我在《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一书中的相关讨论。同样，由于本书的整体结构和调子反映了我作为民族与民族主义学术争论的积极参与者的观点，因此，在关于这些争论来龙去脉的基本描述(特别是在第四章)中，我没有留很大的空间来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不过，我尝试在第五章中勾画出民族的另一种可选择的历史。我还希望在提供领会民族主义研究成果所需清晰分析框架的同时，能够向读者传达过去半个世纪中该领域内学术争论的激情与复杂性。